

III.

专 文



怎样看当前经济形势

薛 暮 桥

一、经济形势很好

当前经济形势很好，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为什么说经济形势很好呢？

看经济形势，第一是看生产发展情况。1979年和1980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是8.5%和8.7%，比1977年和1978年（14.3和13.5%）低一点。但1977年和1978年的高速度有虚假成分，东西生产得很多，有相当大的部分不适合市场需要，积压在仓库里面；而且同过去一段时间一样，不重视人民生活需要，轻工业为重工业让路，越发展越不平衡。1979年和1980年因为定计划时注意到不搞高指标，而且要重工业为轻工业让路，所以1979年比前两年扎实一点，1980年比1979年更扎实。1979年已经改变历年常规，轻工业的发展速度超过重工业，1980年重工业只增长1.4%，轻工业增长了8.4%，开始朝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方向发展。1978年农业生产由于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一年就增长了9%，1979年又增长了8.6%，连续两年高速度发展。1980年尽管遭受了几十年少有的北旱、南涝，农业总产值仍然比1979年增长2.7%。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比较合理了。

第二是看人民生活情况。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继1977年提高工资后又一次提高职工工资，并增发奖金。原来计划压缩基本建设投资90多亿元，增资提价，增加职工和农民的收入100亿元（不包括增加职工和增加农产品收购数量所增加的部分）。执行结果，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没有完成计划，由于计划外的投资增加，总投资还略多于1978年（从480亿元增至500亿元）。增资提价却超过原定计划，达到140多亿元。这几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城乡人民的收入是大大增加了。从1970年到1977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平均每年增加大约84亿元，1978年增加148亿元，1979年增加322亿元，1980年初步计算又增加354亿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约为240亿元）。社会购买力增加的数额和国民收入增加的数额大体相等。也就是说，这两年增加的国民收入，几乎全部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现在农民的每人平均收入，从1977年的117元上升到1980年的170元（三年增加45%）。职工的平均工资从1977年的620元上升到1980年的781元（三年增加30%），去年多数企业职工所得奖金和补贴，大体上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机关职工大体上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人民排队争购的不是普通食物，而是各种高档商品了。与此同时，银行的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

生产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两者中究竟哪一个是经济形势好坏的主要标志呢？当然，改善人民生活必须以生产发展为前提，但在我国历史上，往往只注意生产发展速度而不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所以经济形势的好坏，主要应当看人民生活情况，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在历史上，我们有两次高速度。第一次是开国后的三年恢复时期，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34.8%，农业生产增长14.1%，但这属于恢复性质；经过三年的努力，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才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那时候我们的底子很薄，人民生活在三年中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同现在比较相差很远。1952年部长级的干部还实行供给制，买

不起一只手表；1954年实行了工资制，还买不起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当时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几乎所有的职工都戴上手表，有收音机，有些人还买了电视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工业生产每年递增18%，农业4.5%，人民生活也有显著改善。当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得很明显，群众都坚信不疑。但是，第二次高速度就不一样了，那就是1958年开始的所谓“三年大跃进”，重工业每年平均增长49%，轻工业增长14%，但农业减产，人民生活显著下降。当然，这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形势很坏。从1957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除调整时期（1961—1965年）外，由于年年强调高速度，把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结果是尽管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相当快，人民生活却没有多少改善。年年说“形势大好”，实际上有许多年份并不好。最近两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比不上过去多数年份，但人民生活确实有较大的改善，特别是八亿农民的生活显著地改善了，低工资职工的生活也有了改善。从这个意义来说，确实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当然，这还只是开始，将来还会愈来愈好。

所谓形势很好，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不仅表现在生产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并正在从严重的比例失调中摆脱出来。二十多年来，由于我们不按照中国的国情来进行经济建设，盲目追求高速度，弄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要恢复正常的比例关系，两三年是做不到的。我们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虽然已经两年了，但是由于许多同志认识不深、执行不力，因而收效不大。旧的困难还没有克服，又产生了新的困难。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规划，指出基本建设仍然规模过大，农轻重比例关系仍不协调，能源和交通运输同现在生产和建设规模仍然不相适应，因此今年不但必须继续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还必须主动降低某些部门的生产增长速度，少发展重工业，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人民生活的改善，由于大量的财政赤字和由此所引起的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也不能不进行严格的控制，否则就会使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落空。总之，在调整过程中，还必须走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只要我们拨正了航向，就有可能渡过险滩，继续向前。因此，单纯从这两年生产和生活的变化来看大好形势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了，开始纠正“左”的错误，努力从被动转入主动，看到了真正光明的前途。

二、在形势很好中有严重困难

我们说一方面形势很好，另一方面又有严重困难，这究竟如何解释呢？当然，困难的病根子，是二十多年“左”的错误积累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没有及时纠正“左”的错误，相反，1977年在农业方面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1978年在工业方面又来了一个大干快上，这一年国家基本建设方面的拨款比上一年增加40%多，又大量引进外国成套设备，比例失调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1978年冬三中全会和1979年春中央工作会议，及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开始全面纠正“左”的错误。中央工作会议要求把当年基本建设投资从450多亿元压缩到360亿元，把节省出来的钱用于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人民生活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多少改善，这次提价增资的幅度比较大一点，这本来是必要的。问题是如前所述，由于许多同志看到经济形势很好（这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恰恰相反），看不到调整的必要性，因此执行不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压不下来，而改善人民生活幅度则突破了预定计划，结果就

出现了财政赤字，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

1980年编计划时，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把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从360亿元压缩到240亿元，结果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由于地方和企业有了一点机动财力，计划外的投资大大增加，而且搞了许多以小挤大，以新挤旧的重复浪费的建设。1979年提高40%职工的工资，由于评级的时间拖长，实际上是到1980年夏秋才补发的；这一年还增发了许多奖金和补贴，许多企业的奖金数额大体上相当于低工资职工普遍提升一级。这一年农产品的计划价格提得很少，但许多社队缩小征购派购基数，增加的“超购”数额价格要高50%，许多社队还出售比这个价格更高的议价粮和其它农产品。单单粮食超购议购的加价，就超过50亿元。这些高价收购的产品，大部分在市场平价出售，使国家在物价方面的补贴达到200亿元。人民生活冻结了二十年，确有许多困难，有关部门关心工人农民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人民的购买力连续两年每年增加300多亿元，不但财政上负担不起，也超过了生产的增加。1979年国民收入增长6.9%（按不变价计算），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加18.9%（扣除物价增长因素为12.2%），而社会购买力则增加20%。1980年国民收入也增长6.9%，与1979年大体相同。1980年财政赤字也超过预定计划达到120亿元。因此，去年商品价格上升了6%，其中城市升8.1%，农村升4.4%。

为了消灭财政赤字，控制货币发行数量，确保市场物价的稳定，党中央已经决定坚决压缩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并相应地节减其它方面的开支。最近全国普遍讨论调整计划，有可能把投资数额压缩下来。问题是，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也应该适当控制呢？有的同志认为，应当继续提高工资水平，普遍发放奖金。有的同志认为，为着奖励农业增产，还应当更多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些意见，从局部来看，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全局来看，用多发奖金（或补贴）来抵偿物价上升，发的钞票多了，又可能反过来刺激物价上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如果保持销价稳定，物价补贴将更快上升，增加财政赤字，使物价上升更加难于控制。如果物价急剧上升，我们这两年给人民的一点好处，就将随之丧失。所以从全局看，我们必须坚持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物价的正确方针。为着做到这点，不但必须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同时对人民的购买力的增长幅度也必须加以控制。

现在的经济情况同六十年代初期相比完全不同，不是生产下降而是稳步上升，不是人民生活严重困难而是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改善。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积累基金不能按照计划压缩下来，而消费基金的增长则突破了原定计划。国家支出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了国民收入总额。因此就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商品供求这三个不平衡，引来了经济形势很好之下，稳定市场物价发生困难。克服这个困难应当采取的办法，是按调整计划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行政费用，严格控制人民购买力的过多增长，并采取其它手段来消灭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严重浪费，提高经济效果。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物价，潜伏着的危险也就自然消灭了。

有些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界人士对我们如此重视财政赤字和物价上升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他们说根据西方国家经验，有一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对生产发展可能利多弊少。我国有极少数经济学家也有这类看法。他们不理解，我国和西方国家虽然都有经济困难，但困难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们的困难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所引起的需求萎缩（包括投资和生活），产品过剩。轻微的通货膨胀能够刺激需求增长，缓和产品过剩，防止经济衰退。我们的经济困难是需求膨胀（投资过多，购买力过多），各种产品满足不了需要。现在我们的市场供应（包括物资供应）已经如此紧张，如果物价上升，人民

将抢购各种商品(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这种情况), 市场物价有可能陷入混乱状态。通货膨胀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暂时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 但解决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相反的会加剧我们的困难。凯恩斯主义者的这张药方, 在西方已经难于奏效, 对我国就更加不适用了。

三、认真进行调整、改革, 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由来已久。在中央提出调整方针以前, 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 比现在紧张得多, 使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 仓库里积压的物资愈来愈多, 国民经济早已陷入难于周转的困境。实行调整以后, 由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不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的供应, 比七十年代初期中期好得多了。过去是一年比一年紧张, 现在是一年比一年松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生活的显著改善, 更是调整方针取得初步成效的铁证。现在是中央财政确实很困难, 但地方的钱稍为多了一点, 特别是许多企业有了自有资金,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安排生产、技术革新和改善职工的生活, 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大大增加, 这难道不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好现象吗? 企业、人民手里钱多是好, 决不是坏事。问题是我们的管理工作没有跟上, 地方和企业有了钱就盲目建设, 职工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超过了市场商品供应的可能, 以致出现连高档商品也排队争购的现象。因此在形势大好中, 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严重困难。从全局来看, 我们的经济开始活了。但从局部来看, 财政和信贷出现困难, 需要采取有力措施, 迅速予以解决。

克服困难的主要措施, 首先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管理。具体内容是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 特别是制止地方和企业盲目建设, 以小挤大, 以新挤旧的重复浪费现象。在生产上, 对三十几万个工业企业也要进行整顿, 用联合的办法来减少重复和浪费。与此同时, 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加强控制。过去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经常注意控制职工总数, 那时候工资标准是固定的, 只要控制职工人数, 工资总额也就不会超过。现在不但职工总数控制不严, 工资标准也由于有些企业滥发奖金而失去控制。奖金发多了, 冲击市场物价, 使原来不发奖金的机关也被迫发补贴。在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方面, 1979年一年就提了80多亿元, 1980年计划价格提得很少, 用超奖、议价提价又有很大提高。奖金是对鼓励职工的积极性起重要作用的, 我们不当反对发奖金, 而只反对滥发奖金。议价对增加三类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也起良好作用, 取消议价会把刚刚活了一点的农副产品市场又管死了, 但要防止因扩大议价而减少征购派购数量。这两件事在政策上既要加强管理, 又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想单纯用行政命令来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 而要加强调查研究, 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协助我们进行监督检查。把国家的困难向群众说清楚了, 群众是会协助我们来克服的。

取消财政赤字, 控制货币发行, 稳定市场物价, 是目前首先要解决的紧急问题。但我们的调整工作决非到此为止, 我们还要从根本上来改革经济结构, 也就是改变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以适应我国有十亿人口, 其中有八亿是农民, 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这种实际情况。我们的经济工作, 首先要保证十亿人民、特别是八亿农民都能够吃饱穿暖, 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现在多数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是显著提高了, 从老的几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逐渐转向新的几大件(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电风扇)。我们必须加速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 每发一张钞票都必须有实物保证。近几年, 我们

农业发展比较快，轻工业的发展也开始超过重工业。现在，我们的农业和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加速它们的发展。对于重工业，特别要加强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建设，改变它们内部不合理的比例关系。缩短基建战线以后，许多机械工业任务不足，应当引导它们从支援新建工厂转移到支援老工厂的革新改造，并促进机械工业内部的调整、改组、改造。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调整工作不仅在于平衡财政收支，更加重要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改组。离开了调整来求得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显然是不能的事情。

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点，那就必然接触到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现在许多经济学家指出，我们的国民经济是高速、高积累，并因此而产生低效果、低消费。我们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逐步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如果高速度的结果是低消费，那末这种经济建设还有什么意义呢？产生这种不正常情况的根本原因，一个是前面所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另一个是我们采用了苏联式的过分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财政上是统收统支，生产和流通上是统购包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大锅饭”。如果我们不建立层层核算的责任制，继续“吃大锅饭”，我们就不可能消灭生产、流通、建设中的巨大浪费，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财政也就无法彻底摆脱困境。从这方面来说，调整和改革的最后目的还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那种认为体制改革妨碍经济调整，引起经济困难，是目光短浅的看法。

当然，我们的体制改革虽然方针正确，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对调整产生一些消极作用。我们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级管理，对基层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利润分成，使地方和企业有一点机动的财力可以自己用来安排生产和生活，从方向来说是完全对的。现在总的来说，地方的机动财力还是太少，企业的机动财力就多数来说也还不够。但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这样多，扩大自主权后各级的财务收入只能逐渐增加。如果地方和企业都要求有过多的机动财力，那就势必要挤中央的财政收入。如果地方和企业有了机动财力以后，不用于全国最急需的方面，而是小挤大，进行重复浪费的建设，那就不但不利于调整，而且使调整工作遇到重重障碍。过去两年我们由于在这方面没有及早注意，进行严格控制，推迟了调整的进度。今年为着纠正这种倾向，用国库券等形式把地方和企业多余的资金，暂时集中到中央来统一使用，用于国家最急需的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财政分级管理，仍然是全民所有制，必要时可以采取有偿使用方式把分散的财力集中到中央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如何改进财政分级管理制度，以保证中央财政也能做到收支平衡。总之，要最后克服经济困难，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这是消灭浪费，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有办法克服它。一切悲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试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马 洪

一、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一九七八年冬季举行的党的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清算

了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所造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种种恶劣影响，同时坚定明确地提出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这就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决议，把面临崩溃边缘的经济挽救过来，并且按照三中全会重新肯定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探求一条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党中央进一步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来，这是完全有希望的，两年来的实践，已经给我们展示出这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应当充满信心。

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提出和执行，是我们整个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个根本转变。这个转变，概括起来说，是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的转变，二是达到经济目标的道路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很不深刻，在经济工作中，由于“左”的错误的影 响，过去虽然也常常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经常这样做，存在着某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现在我们实行调整和改革，就是要彻底纠正这种偏向，使整个经济工作真正转到为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轨道上来。

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选择上的错误，也由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失误，主要是第一，在生产建设上，盲目追求高指标而忽视经济效益；第二，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挤了农业和轻工业；第三，扩大再生产单纯地依靠新的基本建设项目，忽略了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第四，一味追求象钢铁等重工业初级产品、中间产品的产量，而严重忽视产品的品种、质量，特别是严重忽视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第五，片面追求高积累而挤了人民必需的消费；第六，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脱离实际地急于想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过早地否定了城镇个体经济的作用，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实行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这些错误，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经济恶性循环。我们现在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要克服经济建设道路上的“左”的错误，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确定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新路子。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我们的根本目的。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不再盲目追求高指标而不讲究经济效益，也就是我们将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在极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达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一味追求象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而不顾质量，不顾品种，不顾社会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而按照消费者的需要，市场的需要，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需要，来安排生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包括国防的需要。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将改变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力求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结构，使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技术、文教事业等得到协调发展，以保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生产的增长，将不再主要依靠盲目地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而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在整顿和改组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来提高生产能力。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不再采取盲目追求高积累、压缩人民的消费需要的错误做法，而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得到合理安排，这样，才能做到速度快、积累多、效果好，人民的需要也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将逐步改变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合理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企业和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保证人民的合理的需要得到满足。这种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将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加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同时并存。

这种转变，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工作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

总之，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将逐步做到协调发展，稳定增长，实现良性循环，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的新路子来。

由此可见，我们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是为了克服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部走上新的轨道，也就是走上提高经济效益，满足人民需要的轨道。因此，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转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转变的战略意义。

对于战略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所谓战略，是指涉及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长远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写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有名的著作。这对于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曾经遇到过严重挫折，后来，取得了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从错误的战略转变到正确的战略。在革命战争中没有正确的战略，就不可能使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同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没有正确的战略，也不可能使经济建设获得成功。

总之，我们要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调整时期和八字方针的意义。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就能知道调整时期多么重要，调整和改革工作多么重要。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有过几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变，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抗战前夕，一次是抗战胜利以后。这几次战略转变的伟大胜利，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这一次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取得伟大胜利的。

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这样一些看法，是否妥当，请大家考虑。

国务院领导同志最近说过：我们要“通过调整和改革，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管理体制合理化，企业组织合理化，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我想分别讲讲同这三个合理化有关的一些问题。

二、关于调整与经济结构合理化

我国经济调整，从根本上来说，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彻底改变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健康轨道，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与经济调整的要求

为了说明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也为使调整工作有步骤地进行，使调整措施更有针对性，就需要对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如前所说，长期以来，我们经济工作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 响，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 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的安排，主要是靠投入大量资金和能源，扩大基本建设，办许多新厂子来解决的。这样，工业虽然建设起来了，但不能和农业形成统一的生产体系；重工业虽然建设起来了，但不能和轻工业形成统一的生产体系。特别是在重工业的建设上，又片面强调“以钢为纲”，消耗了大量能源，占用了 很多运输力，而且花费了大量投资，不但挤了农业、轻工业，也挤了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结果造成重工业本身发展的不平衡，能源和交通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而钢铁工业本身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这样，日久天长就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即某些重工业部门过分突出，而农业、轻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相当落后。而且，地区搞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部门、企业又搞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系统。这样，比例失调、构造松散、机制失灵、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就成为这种经济结构的特征。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上述的路子，投资大、消耗高、效果差，群众得不到实惠，往往造成经济的恶性循环。今后必须走出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经济效益的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把国民经济真正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交替出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效果比较好。“大跃进”以后，我们走了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路子，把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放在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高指标”上。为了实现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势必在生产上搞高指标，在基建上搞大规模，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搞高积累，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在资金的使用上又不讲经济效果，消耗高、浪费大、投资不见实效，结果国民收入增长很慢，贫穷落后的面貌难以改变，群众生活也难以提高。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又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于是又搞高指标、大基建、高积累、大浪费，如此循环往复，造成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工业规模已经不小，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也不低，平均每年递增13%左右，但是，很多产品的品种、质量不符合需要，中间产品多，最终产品率低，能够用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很少，以致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国家仍然很穷，人民生活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在于如果因为宏观决策的失误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以后，可能通过有计划的调整，使比例关系重新走向协调。经济调整，就是要把各部门相互脱节、畸形发展的不合理经济结构调整过来，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这种合理的经济结构要求把以建设重工业为目标的指导方针转变为以增产最终消费品为目标，根据人民消费和社会消费的需要，确定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根据最终消费品生产的需要来决定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建立起以最终消费品为目标的包括工业和农业在内的协调发展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结构建立起来以后，原料工业和中间产品加工工业都为最终产品服务，每个行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明确的服务对象和奋斗目标。这样，它们所生产的产品都会成为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产品，使社会产品的供给能够更好地和社会的需要衔接起来，从而使社会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结构，就是能够比较充分和比较有效地利用我国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能够协调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

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需要探讨的几个理论问题

要按照上述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的调整，有若干理论问题是需要探讨的。这除了要正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继续批判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以外，还有以下一些理论问题值得讨论。

长期以来，我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当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方法。我国长期的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同这样指导思想紧密相关的。我们调整国民经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要求把以建设重工业为目标改变为以增产最终消费品为目标，就必须重新评价这种指导思想。

实际上，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表明：重工业是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是适应农业、轻工业和其它生产部门对于生产资料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有的同志说，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样看问题，并不一定符合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进程，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宁可说是近代和现代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说过：“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①从最终的目的来说，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为了消费。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一般联系，是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就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联系来说，这个一般规律就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最终总是为消费资料生产服务的。就近代和现代工业生产来说，这个一般规律表现为主要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最终总是为主要生产消费资料的农业、轻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其它服务业服务的。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和大工业》第一节《机器的发展》中，曾经从大机器工业发展史的角度，对这个一般规律的表现作过详尽的分析。但是，过去人们往往只把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过程中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而忽视了马克思对近代工业生产一般规律所作的分析。诚然，马克思在论到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时曾经说过：“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②他在讲到近代大工业（包括轻工业）的发展要求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时也说过：由于手工业生产机器比机器生产的机器“很昂贵”。^③但在这里，马克思主要还是阐明了这个思想：“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④这就告诉我们：近代轻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求作为重工业最重要部门的近代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或者说，后者的发展正是以前者为基础、并且是适应前者的需要而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分析是同英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完全相吻合的。如果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作为英国产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的话，那么英国近代轻工业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的。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是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才在实际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而在随后的几十年，由于大规模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生产出来。^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又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角度对这个一般规律的表现作了全面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曾经对这个分析作了这样的概括：“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卷第3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08页。

③ 同②书，第42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0～422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2页。

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①如果把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的生产”换成“生产资料的生产”，那么，这个原理不仅对社会主义是适用的，而且特别是有效的。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可见，无论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或者是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进程都表明：生产资料生产最终总是为了消费品生产服务的，因而，重工业总是要在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适应它们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这是近代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并不因社会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而有所不同。

可见，调整经济，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把建设重工业为目标改为以增产最终消费品为目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同近代和现代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有的同志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这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呢？应该看到：苏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曾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之下。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处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而且，由于苏联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违反近代和现代工业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所以，尽管它对苏联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增强防御希特勒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济结构失调的状态。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力量的话，那么，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苏联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却成为苏联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军事扩张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了。这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是应该分清的。苏联坚持这种经济战略，早已陷于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困境。

这样说，是不是就否定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了呢？把增产最终消费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否就是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相矛盾的呢？看来，并不能这样来理解。因为，第一，什么是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呢？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更快。”^②分别说来，“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③而把增长最终消费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初级的和中级的产品的生产为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服务，要求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生产为主要提供消费品的农业、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服务。这是两种不同的含义，坚持后一点，并不必然导致否定前一点。就是说，在把增产最终消费品作为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仍然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问题在于：重工业的发展方向是自我服务、自我循环呢？还是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第二，生产资料为什么要优先增长呢？就是在某种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实现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求，快于对追加劳动力（从而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列宁说得很清楚：所谓生产资料增长最快，不过是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的规律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④但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较快的增长，正是在某种技术进步条件下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扩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41页。

②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72页。

③ 同②书，第71页。

④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第71页。

大再生产而引起的。至于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较快的增长，虽然直接是由于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引起的，但终极地说来，仍然是由于消费资料生产的需要引起的。所以，整个说来，生产资料生产较快的增长，是由于消费资料生产的需要引起的。列宁说得好：“不言而喻，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①可见，无论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含义来说，或者从它的原因来说，同把增产最终消费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都不是不相容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长期以来，有的同志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在任何条件下，近代和现代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我国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不能说同这种理解没有关系。现在看来，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是全面的。第一，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只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才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在技术没有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并不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资本积累过程，首先就分析了资本构成不变条件下的资本积累；第二步才分析了资本构成提高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马克思这个理论分析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的。第二，近代和现代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历史表明：有一种技术进步，如农业中的同生物措施相联系的技术进步，并不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有一种技术进步，如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则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可见，并不能以为，只要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都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第三，即使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但能否优先增长，还要取决于其它的条件。就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情况来看，轻工业技术进步很快，生产发展也快。但当时轻工业使用的机器还是由手工作坊提供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并不快。这除了其它原因以外，缺乏发展重工业所必须的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我国工业发展来说，在建国初期的一定时期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有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轻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重工业很薄弱。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农业、轻工业的增产潜力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以某种较快的速度发展重工业是应当的。但在后来，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脱离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但还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那就走到了事情的反面，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可见，不仅把增产最终消费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理是不矛盾的；而且在某个时期内把优先发展轻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原理，也是可以相容的。

支持这种看法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不合理的“重型结构”逐步调整为“轻型结构”。有一种设想，所谓“轻型结构”就是指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占60%以上，重工业占40%以下；所谓“重型结构”，就是指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40%以上，农业、轻工业占60%以下。这种划分的出发点，是想改变农轻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态，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改变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的结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实际上，按照这种观点，就要得出否定继续优先发展轻工业的结论。因为在198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已经占了将近60%，今年以来，大约要超过60%了。这种划分方法的不妥之处，不仅在于轻、重工业的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越来越具有相对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它没有包括在现代化生产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服务业以及科学、教育、卫生等重要经济部门；就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主要的缺陷还在于：第一，在我国农业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34页。

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究竟各占多大的比重表明它们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比例，它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增长等等复杂因素。即使就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认为上述“轻型结构”的标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我国农业、轻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这个标准了。但农轻重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第二，这种单纯从量的比例关系方面来划分产业结构的方法，并不能反映结构的质的方面，因而并不能表明结构是否是协调的。从理论上说来，我们完全可以作两种设想：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但它是建立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并且是为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服务的，因而它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就是协调的。在相同的生产力条件下，重工业也占40%以上，但重工业是自我服务型的，表明它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是失调的。当前我国重工业虽然占了40%，但比重仍然是过大的；而且重工业自我服务的状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因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仍然是不协调的。这样说，当然不否认近两年来在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近两年来，轻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农业发展多年缓慢的局面也有了显著的改变，重工业在调整产品服务方向方面也有新的进步。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难以在一两年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再加上在贯彻调整方针方面，某些部门在过去一个时期还执行不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缓了调整的进程。总之，当前要调整产业结构，不仅要加强农业，继续坚持优先发展轻工业，而且要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面，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的不合理状况，使得产业结构逐步走向合理化。

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步骤的设想

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和步骤问题，是我国经济调整工作中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关于经济调整的目标和步骤可否作以下这样的设想。

总的说来，经济调整的目标，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起一个以增产最终消费品为目标的、比例关系较为协调、经济效益比较高、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部门内部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大体协调；第二，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比较合理的利用；第三，生产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紧密联系，互相促进，建立了这样的经济结构，我们就能够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从而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保证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稳定的改善。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经济调整可否考虑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稳定经济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财政平衡，稳定物价，稳定经济，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发展商业、服务业、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排待业人员就业，使人民在保持现有收入水平的条件下生活继续有所改善。这个阶段大体要两年左右时间。第二阶段是进一步协调两大部类比例关系。重点是更好地调整农、轻、重比例，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基本协调，从而保证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继续改善，这个阶段大体要三年左右时间。第三阶段要进一步解决能源、交通、邮电、通讯、城市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比较协调的关系，使经济效果有显著的提高，人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实现这个阶段的任务大体要五年时间。

这些显然只是一些大体的设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去论证它，充实它，完善它，修正它。

以上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可划为调整时期。在第二阶段的目标达到以后，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农轻重比例基本协调，因此，以调整为中心的时期也就结束了。第三阶段的调整任务，可以在今后经济正常发展过程中完成。

三、关于改革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合理化

要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不仅要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而且需要实现经济管理体制的合理化。

为什么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这种体制，从它的基本形态来讲，是从苏联搬来的，也就是说，类似苏联斯大林后期的那样一种体制。我国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有不少弊病的。这些弊病综合起来有四条，第一是使企业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否定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我们的企业就象算盘珠一样，由中央各个部门、地方各个厅局把它拨上拨下，推一推，动一动，自己缺少主动性。这并不是企业不想有主动性，而是我们的体制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第二是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管理经济，它们自成体系，割断了经济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的企业是由中央或地方的主管部门，以条条为主管理的，主要是纵向的联系，缺乏横向的联系。这就产生了很多不合理的现象。第三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指标过多，管得过死，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直接见面，产销脱节，产需脱节。这样，一方面很多产品大量积压，一方面很多产品又脱销。第四是统收统支，捧“铁饭碗”，“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不负经济责任，不讲经济效果。由于存在这些弊病，这种经济体制必然不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不利于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管理，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这种经济体制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不断变化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这种体制在计划上大包大揽，在流通中统购统销，在劳动上统包统配，在财政上统收统支，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求有一套高度集中的、主要采用行政手段的管理方法，甚至排斥用经济手段来管经济。这种管理体制和方法，是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经济不活跃，经济效果差，同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的弊病有很大关系。

我们所以长期实行这种管理体制，是来源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认识。具体地说，是由于我们过去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把它看成半自然经济。现在我们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正确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方针、政策，办法等问题的前提。

应当怎样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呢？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多数人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主要的争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有的同志认为不是商品，因而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这种观点过去占统治地位，现在也还有人坚持。

我个人也认为，现阶段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当然，我们这个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有性质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同时是无计划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而且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是有性质的不同的。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飞跃。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一直有着争论，同志们读过《哥达纲领批判》，这是在一八七五年写的。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就讲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还保留着旧社会的痕迹。他说的旧社会的痕迹主要是指按劳分配。马克思那时设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马克思当时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中等程度发达的国家，甚至象我们这种资本主义只有初步发展，自然经济还占优势的国家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而象我们这样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商品货币范畴，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我们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些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是不是立即可以取消商品生产，取消货币呢？这个问题，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最近几年，我有机会到日本、美国、西欧几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去考察。我们去考察的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些国家和马克思当时所讲的情况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了。马克思也没有预见到一百年以后，资本主义还会有这样大的发展。马克思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一百零五年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是几十倍地甚至更快地发展了。但即使现在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而不致妨碍经济的发展，并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呢？看来还不可以。假使那时候货币改个名字叫劳动券，劳动券还是起货币的作用，那有什么意义？假使真的取消货币，也就是取消商品经济，那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在日本东京看了一个百货公司，叫三越百货公司。和美国纽约的美西百货公司比起来，它还不是最大的。它的商品品种有50万种。我们国家最大的百货公司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就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经营商品4万多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只经营两万四千多种。我们在美国的旧金山近郊一个近20万人口的小城镇看了一个超级市场，这个超级市场专卖食品，共有一万四千多种。假如没有商品货币了，这些产品怎么有效地进行分配呢？人类诞生以后，经过了多少万年，经过了无数次生活的实践，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发明了货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人类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要取消它，就要找一个比它更合理的东西来代替它，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看来，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还只能当作一种设想，还要留待后人的实践来检验。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候，在劳动还没有普遍成为人们生活第一需要的时候，要取消商品经济，要取消货币，看来是不现实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写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引了马克思的话，阐述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也是主张社会主义取消商品和货币的。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采取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干涉和内战的环境，但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指导也不无关系。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尝试失败了。列宁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当时苏联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小商品经济和小生产的大量存在，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要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幸的是列宁很快去世了，没有赶上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了，而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了，在